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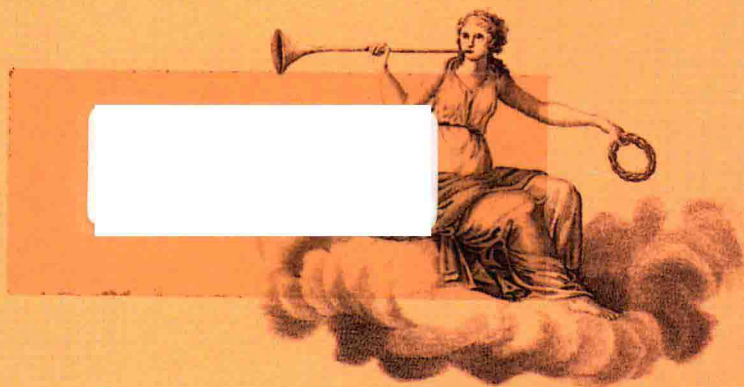
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The History of Western Ideas and Cultures

语境·概念·修辞

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李宏图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The History of Western Ideas and Cultures

语境·概念·修辞

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李宏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境·概念·修辞: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李宏图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3
(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1834-6

I. 语… II. 李… III. 思想史-研究-欧洲-近代 IV. 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8966 号

语境·概念·修辞: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李宏图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字数 317 千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834-6/B·560
定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自 2011 年开始,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建设世界史一级学科的过程中,本着从本系世界史学科的现实出发,考虑其学术传统,也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并符合国际学术的主流走向的主旨,拟议在本学科中提炼出相关的数个方向进行发展,而思想文化史也列在其中。为此,经过从事本方向研究的各位老师数次的讨论商议,决定编辑出版“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系列丛书,一则将本方向同仁的研究成果及时出版面世,以供学界批评参考之用,二来也可建立起一个学术平台,从而可以吸引本系同仁之外的其他学者参与,求得更多和更好的学术著作进入本丛书,以扩展影响,进而形成一套具有学术展示和引领作用的学术研究丛书。而在此过程中,复旦大学出版社也为了支持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欣然同意将本套丛书列为该社的出版计划,于是便有了这套丛书的问世。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就编辑出版过“世界文化史”研究丛书,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既推动了文化研究和世界历史研究的深入,同时也对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本研究丛书当然是这一学术传统的承续,也是其光大和发扬。将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三者融为一

体,侧重于在思想观念、仪式象征以及话语表达等方面展开,既讨论精英的思想,也探讨大众的观念、情感和心态;既研究个人的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也关注某个群体以及社会思潮和社会观念;既注重文本的分析,也考察仪式、象征和话语表达;既在史学演进的层面来研究其思想观念和不同流派的演进,又将史学本身也看成为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一种表达。由此,在研究内容上,我们不囿于以往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独立划分,而是在新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逐渐合一、互有交叉的背景下,拓展其思路。这也就意味着从前思想史和文化史各自进行独立的分支研究已经过去,两者之间的融通已为学界之主流,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新文化史研究大有取代以精英和文本为主的思想史研究之趋势。难怪国外有学者称,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正是在研究内容不断扩展和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将之冠名为“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也凸显和呼应着这样一种国际学术界的新变化。并且我们还设想在这一学术视野中形成学术研究的新路径,打造一套具有特色的学术丛书,进而也推动着我们自身研究领域的深化,改变历史研究的实践方式与提升学科队伍的建设水准。

在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世界历史学科,特别是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方向的各位同仁全力参与,奉献出了各自的学术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诸位编辑也为此花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并且为本丛书成功地申请到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的资助,这不仅是对这套丛书设想的肯定,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更多的责任来回报如此高规格基金的支持。同样,复旦大学和历史系在进行“211工程”三期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也将本丛书列入其计划予以支持。在本套丛书即将面世之际,我们对上述提及以及没有提及的个人和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这种谢意并非是一种常规的客套,实际上也印证了,在学术性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这一生产链或者说学术共同体的多个环节相互配合和支持,可以设想,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的话,这些知识无法得以面世和进入市场来进行

展示与流通。

本套丛书的面世还仅仅只是一次启动,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也许更为沉重的压力在等待着我们,但可以相信,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而在这种理解中,从思想文化入手是比较好的路径。因为思想文化既是引领行动的基础,又作为独立的存在而建构其实践性内容,塑造着实体性存在本身。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诸位同仁将会在今后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将此丛书的编纂坚持下去,以取得新的进展。

“复旦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2年9月



前言

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坚持着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历史的解释只是为了寻找到历史的规律或者历史的真实。正像英国历史学家乔易斯所说,只要勤于耕耘,将会获得一个应然而坚实的客观性。仔细探究,导致这样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看起来更加依赖于具体、确切的材料,才能进行解释,得出结论;二是自近代,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人们相信,在理性的引导下,我们能够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进而发现世界的客观真理。也正是在这种本质论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学的具体特性的结合中,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完全等同于发现材料,获得历史的真实,他们也因此而自鸣得意,俨然以历史规律的守卫者和历史未来发展的预言者以及引导者而自居。同样,一旦人们谈起历史学家,便总是赋予了他们认真严谨,承载着探讨人类兴衰和历史规律重任的一种形象。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历史学界,一批历史学家在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的促动下,开始反思历史学的上述特性,并且逐渐摆脱了历史学的上述解释模式和内含的这种目的论,开始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看成仅是

一种叙述与理解。随着这些观点引入我国,现在,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这一新认识或许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对这一结论后面的理论展开或者路径取向却需要详加梳理。我们知道,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他们通过多种不同的理论路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一结论后面的论证过程远远比知道这一结论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透彻地理解西方历史学理论的变化,思考如何把西方的历史学理论与我国的历史解释资源相结合,走出我们自身特色的历史解释道路。

在改变历史学解释模式的多种路径中,语言对历史叙述的作用当是其重要的一种。受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福柯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语言与历史以及历史解释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人类的语言或者“话语”并非如镜子那样直接或完全反映着既定的社会实体和意义,相反,语言在自身的配置中生成着意义。这样,人们通过语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通过语言的一种“建构”。当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理论应用于历史学领域时,结论自然非常明朗:正是语言配置和运用使历史学的解释无从再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

以往,我们总是把历史看成是叙述一种事实,讲述一个已经发生与存在过的故事,但我们却没有仔细探讨,在我们进行这种研究、展开叙述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有对这些材料进行“发现”等主体的活动之外,我们还需要使用语言的配置这样一种重要的工具来进行讲述。一旦这样的活动展开,语言作为独立的功能就自然在发挥着作用,从而就使历史学家使用语言所描写出的历史与原来的“历史”有着不同,历史的结构和叙述具有了多样性,历史学家所“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再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由此,从前被看作为真实的历史现在却变成了仅仅是“一种修辞策略”,历史的故事,就好像事实的陈述一样,“是语言的本质并且有一套论述的规则”。

这种对传统历史学的“颠覆”还只是从历史学家——这个历史解释

者的主体的视角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转换一下研究的对象,从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历史材料——文本来看,更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当历史学家面对着他所要研究的文本时,他如何处理这个文本?他能否对这个已经有着文本记载者所使用的语言而带来的“意义”保持全部的信任?这里,自然引申出历史记载者所使用的话语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原来作者所使用的话语。他为什么要使用这一词语而不是另外的词语,他是如何定义这一词语的,以及如何将这一词语具体化的;在当时多种词语并存,也许常常在互相冲突的情况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词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是什么机制、什么动力使之形成了“话语霸权”。这样,在历史的进程中,历史的演变就变成了语言的不断变化,以及围绕语言的编织而展开的过程。按照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说法,形成了“谱系”。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追溯和“解构”这样的谱系,在历史中不仅是发现延续,而且也需要找寻“断裂”。

也许如果我们用思想史这样的个案就更能够理解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思想家们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即使使用相同的一个词语(在经常性的使用中甚至变成了概念),其定义也许大为不同,甚至格格不入,如“民主”“自由”等。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意义有所变化,不同的群体对相同的词语或概念也会作出不同的定义;同时,语言对于意义的多重性也容易造成即使是相同的词语与概念但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想理解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话,就必须抓住那些基本的“概念”词语及其语境,透过这些词语的线索来把握和理解他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来选择这样的词语,以表达他的什么思想,从事着什么样的行动,并且反映了社会的何种需要。由此,有些思想史家认为,思想史研究被定义为探究和解释不同群体以及个人所使用的言语,他们想通过这些言语的修辞表达什么,以及希望实现什么目的。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与作者一起和在作者所表达的范围内认同作者的词语,去显示作者所使用的言语如何自动行使着规定作者想说和如何想说的功能。这样,思想家们所写的思想原著不仅被看成是可供今人研究的思

想性文本,而且更是思想家本人使用言语和修辞并诉诸行动的文本。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实现了对研究对象的彻底转换,思想史要研究的那些思想家的著作,不再仅仅被视作为基本的第一手资料,还应该将其看成思想家本人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语言结构所创作的文本。正如波科克所说,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已转换为对语言和话语的研究。由此,当思想家的著作被看成为“文本”,那么关注文本的形成,以及对文本的阅读战略自然就应成为思想史研究的有机组成。

无论是从历史学家这个主体还是历史的研究对象这样的客体来分析,都能够看到语言在历史叙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模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学特性的理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不再仅指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而是作为历史叙述者的历史学家的叙述,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的一种自我能动,以及是这种能动性的产物。显然,与过去的研究方法相比,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深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将过去历史学家常常所忽视的内容提升到了可以研究的范围,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并能够取得大为不同的成果。总之,它开辟了历史研究的又一新方向。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将这样的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变化称为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实际上,当代西方历史学家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要追寻历史的意义。在历史中,意义来自哪里?是材料自己,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材料与文本的语言之中,以及历史学家的主体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当代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我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意义。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野转移到古代的中国的话,在司马迁的《史记》那里,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历史学家的语言运用与历史叙述相结合的良好典范,太史公对语言运用的高超技巧至今仍然让人赞叹。但问题是,这样的历史学传统如何在后来发生了改变,使得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忘记了语言,忘记了语言与意义的密切关联。与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的转向相比,同时也与我们自身的历史叙述传统相比,我们现在的

历史研究依然在追求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由此导致了在历史事实的找寻中,形成了一种僵化的语言模式,或者说“话语霸权”。但历史给我们讽刺的是,这样的研究范式,并且成为唯一性的研究范式,恰恰遮蔽了历史,影响着历史的解释和意义的发现,阻碍着历史学的发展。

“语言不断地产生意义”,面对着历史的文本,历史学家通过自己“创造”着知识和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发现”;这样,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历史学家主体的一次新的“再发明”(reinvent)。面对着这些新的论点,即使西方历史学界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很多历史学家在“捍卫历史”的旗帜下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将其划归为“后现代”历史学阵营。同样,这些属于后现代历史学阵营的历史学家也坦陈后现代的历史学正“伫立在悬崖边”。但是,不管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对历史的这种新的理解却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实践脚步。相反,在经受着激烈的批评和自我的修正之后,“后现代”史学愈来愈蔚为大观,成为历史解释的新路径。



目录

前言 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1
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1
思想史还是文化史——当代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新转向	41
概念史与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	71
论“革命”——一个竞争性概念	90
法国革命的历史分析——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札记	97
治国的技艺——以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127
思考“人民性”——托克维尔论民风民情	143
“革命式”社会转型道路的选择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法国大革命的比较研究	175
关于“自由”概念的历史性思考	214
英国革命时期共和主义者对“自由”的理解	220
政治权力与人民反抗	
——约翰·洛克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	243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再思考	260

1978 年以来的中国西方思想史研究	281
--------------------------	-----

附录

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

——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	325
-----------------------	-----

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克里斯托弗·J·贝瑞教授访谈录	342
----------------------------------	-----

后记	367
----------	-----



语境·概念·修辞

——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多年来,在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中,一直存在着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这样一些问题。尽管读到过一些学者对此的论述,但始终还是未能解决我心中的疑惑。随着研究的深入,愈发觉得这一问题的重要。不解决思想史上的这一“元”问题,我们也就很难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我们的思想史实践。同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西方,特别是欧洲学术界对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日渐兴起,已经实现了思想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巨大创新,其表现为实现了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梳理欧洲学术界思想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进展,理解其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谱系,在“他者”的语境下思考其不断创新的内在学术动力将会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丰富我们的思想史研究。

—

在西方学术界,思想史一般被称为“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为什么要分为这样两个名词?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一番仔细的辨析。一般来讲,前者主要是指心智、知识、精神等内容,知识分子

就是这一词汇(intellectual);而后者更多地指“思想”(thought)这样的观念性的内容。似乎是前者的面宽,而后者稍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指代的都是一种超越现实实践层面的精神上的观念力量。思想史家们认为,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要超出于物质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启蒙运动的观念而引发的。路易十六在阅读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后,叹息道:“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法国历史学家饶勒斯在分析大革命的原因时也说:“社会革命将并不仅仅依靠事物的力量来实现,它要依靠意识和意志的活力。”^①这只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意义:追踪事物的原因。就思想史研究本身来说,它还包含着另一层意义,即探寻“价值”,探讨世界的真理、价值和意义。而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有意义。如果说对原因的探讨是追溯过去的话,那么,这种对“价值”的探讨则将引领人们走向未来。

思想史,又称为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这一概念最早的起源可以上溯到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伏尔泰曾把理性的成长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但对观念史的研究只是在 19 世纪末才出现^②。为什么在这时会在原先已有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概念之外,另创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这一新概念呢?思想史家保曼作了这样的分析:当时,从事文化史与政治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之间展开了争辩,文化史学家不满足于历史研究只限于政治史,想要突破政治史的局限,把历史研究扩展并包括文明、思想、物质和政治,其代表性人物为雅各布·布克哈特和阿克顿。阿克顿在 1880 年写道,在理解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课题就是洞察和把握隐藏在人们之后的观念,观念有着自己的传统,从古至今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发展,在这一演进中,观念远远超过法律父母的地位,扮演着教父和教母的角色。1895 年,阿克顿成为剑桥大学

① 转引自王养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历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

② Franklin L. Baumer, *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 1600 - 1950*,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7, p. 3.

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他在所作的首次演讲中说道：“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观念的演进，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①他在主编《剑桥近代史》时突出了这一主题。在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在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的黑格尔讲座教授后，他通过努力把历史观念史确立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并建立起了历史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在他看来，观念史不只是研究人的理性的思想，它还应包括非理性的一面，如意志、想象等方面。这时观念史出现的另一原因是，这些历史学家们反对实证主义，反对科学决定论，他们坚持认为，在人类行为中，观念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观念体现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这样，对观念的重视直接促进了观念史研究的兴起。

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说，历史观念史的真正建立并成为人们的普遍兴趣是在20世纪。一大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投入了观念史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学者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他扩展和深化了狄尔泰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思想史研究。而在美国，则是阿瑟·洛维乔易教授，作为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致力于观念史的研究，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使观念史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随后，美国很多大学都相继开设了观念史课程，并且制定了教学大纲并编写了教材。观念史甚至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杂志，1940年，《历史观念史》杂志创刊于纽约，同年，观念史词典也开始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当观念史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之时，欧洲各国却并未步其后尘。在法国，就不存在着观念史这样一个概念，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有关内容常常被称为心态史、心理史学、社会观念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欧洲虽然也出现了一批观念史家，如伯哈德·格罗休伊森、费德里克·查保德、丹尼尔·莫奈特、保罗·哈泽德、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巴兹尔·威利等人，但实际上观念史这一内容在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指称。正像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所说，在

① Franklin L. Baumer, *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 1600-1950*, p. 2.

法国,观念史(histoire des idées)很难立足,在德国是思想史(Geistesgeschichte)占统治地位,而在意大利,思想史(storia intellectual)则没有出现^①。

尽管观念史的概念已经出现,并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各国学者对观念史内涵的理解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无法达成共识,使之得到明确一致的定义。正像洛维乔易所说,对观念史中的观念指示着什么有很大的分歧^②。保曼认为,观念史指的是人们的观念、思想的内在世界,但观念也可以指从少数精英的思想到普通人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观念史介于哲学史与文化史之间,它比哲学史更宽,但没有大众文化宽泛。观念史并不仅仅研究少数精英的思想,这些通常是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而文化史通常要研究大众的行为、习惯、信仰和所有人的观念。至于思想史,它是观念史中重要的内容。观念史关注于思想史的内容,因为思想史体现和代表了把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的某些观念和信仰进行加工和提炼以及表达的作用。例如,思想者们通过文章、诗歌、戏剧和绘画等方式来宣传和表达其他人明白他们所经历的和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思想者呼应了其他人的观念,并进行了加工和提炼^③。

那么,两者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思想史家琼·埃哈德认为,历史观念史包括三种类型的历史:一为大的世界体系中的个人历史;二为由观念所体现和代表的集体和不同的现实的历史;三为思想和情感样式的结构史。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

①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3.

② Franklin L. Baumer, *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 1600-1950*, p. 6.

③ Ibid., pp. 7-8.